

西藏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

扎央¹, 罗绒战堆²

(1. 西藏江孜县中学, 西藏江孜 857000; 2.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中国西藏自治区虽然“地大”, 但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物博”。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 特别是农牧区人口的快速增加, 西藏的一些自然资源也面临过渡开采和利用问题, 这一问题在西藏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使得西藏这一最古老的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 作者还从多个视角提出了应对这一挑战的诸多建议。

关键词: 人口增长; 资源承载能力; 西藏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2)02-0003-06

Tibet Population and the Carrying Capacities of Land Resources

ZHA YANG¹, LUORONG Zhan—dui²

(1. Middle School in Jiangzi County of Tibet, Jiangzi County, Tibet 857000;

2. Institute of Social Economics, Tibetan Study Center of China,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the territory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s very vast, but some basic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arable land and grassland are not as rich as people usually think. With the population increases,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Tibet is facing the problem of over-exploiting and overloading some natural resources. This issue is more severe in the prairies of Tibet.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stockbreeding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The authors present some suggestions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Keywords: population increase; carrying capacities of 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ibet

一、西藏的人口现状与耕地资源的承载能力

一谈及西藏, 人们想到的总是西藏地大物博和人口稀少。诚然, 自治区拥有 12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 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只居住有 230 万人口, 人均拥有 0.52 多平方公里, 相当于人均拥有 780 亩土地。乍一看, 占 15.4% 的土地面积所承载的国民总人口的量不足 0.2%。然而, 我们应看到, 除去雪岭冰山和高山荒漠, 可以利用的土地特别是耕地非常有限, 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只有 330 万亩左右, 仅占自治区土地面积的 0.18%, 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不到 1.5 亩, 与全国人均 1.4 亩的水平基本持平。就耕地资源而言, 西藏根本就无“博”可言, 考虑到西藏的

收稿日期: 2001-4-11

作者简介: 扎央(1967-), 女, 藏族, 西藏亚东县人, 西藏江孜县中学数学教员。

自然环境十分恶劣,耕地的产出率较低且有部分耕地需要轮休,绝大多数地区只产一季的状况后,西藏的实际则是“地大田薄”,与全国水平相比,西藏的耕地资源绝无优势可言,人均粮食还显不足。

若进行纵向比较,1952年,自治区的耕地面积为245万亩,人口115万左右,那时人均占有耕地2.13亩^[1],40多年过去后,自治区的人均占有耕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近1/3,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口的高速增加远远超过了耕地的增幅。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西藏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各种基本建设占用耕地的现象日趋严重。资料显示,1981年~1990年的十年间,全区净减少耕地12.58万亩,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小县的耕地,而在同一时期,全区人口净增加34万人,年均增加3.4万人,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中等县的人口,人地矛盾日渐突出^[2]。西藏的耕地资源已承载不了更多的农业人口,这一问题已成为制约西藏经济发展,导致部分农牧民生活水平下降和贫困的重要原因。

二、西藏的人口现状与草地的承载能力

也许有人会提出,西藏除有限的耕地资源外,还有广袤的草原和无际的草地。从表面上看,西藏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拥有全国四分之一强的草原面积,总面积达12.44亿亩,其中,可利用草场有8.25亿亩,人均占有近400亩,是我国平均水平的100倍,是世界人均拥有量9.2亩的43倍,因此,仅从“源”上分析,西藏的自然草原确是无限辽阔。然而,当我们关注一下自治区草地的生产能力和载畜现状后,我们为西藏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西藏的草地生产能力和承载能力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当翻开有关自治区人口统计材料,我们发现,近几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是那曲、阿里这样的主要牧区,一般的自然增长率保持在20%左右,高出自治区平均水平5~7个百分点。以西藏的主要牧区——那曲为例,1996年末的人口总数已达337590人,也就是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口较民主改革时的1959年增长了3倍,40年的年均自然增长率高达27.8%。即便今天,人口自然增长率过高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有效扼制。

西藏牧区基本是单一的游牧经济,牧民们只能依靠扩大牲畜规模,即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道路来满足新增人口的生产和生活需求。我们对西藏的人口自然增长曲线和牲畜的增长曲线进行了一次比较,两条曲线基本呈平行状,也就是说,自治区的人口自然增长与牲畜的增长基本同步。但在那曲这样的牧区,牲畜的增长幅度仍赶不上人口的增速。在过去不到40年的时间里,那曲地区的牲畜只增加了50%,远远滞后于人口的三倍增幅。现在那曲地区牧民人均拥有牲畜19.5头(皮),与1959年的人均拥有29.4头(皮)相比,人均减少10头(皮),这也同时意味着,在当前的一些西藏牧区,牧民们的人均拥有牲畜量与民主改革前相比有大幅度的下降。这更意味着牧民们的“人均财富占有量”的下降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富裕程度的降低^①。可见,由于象那曲这样的牧区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人均占有牲畜大幅度下降,牧户的“富裕程度”还不及民主改革前的1959年。此外,西藏牧区人均牲畜绝对量的减少会不会使牧民更怜惜牲畜的生命,更注重维持牲畜的数量。为什么价值规律不能有效地左右西藏牧民的生产 and

① 这里引入牧民“财富占有量”的概念是有意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牧民“生活水平”的概念。因为在西藏的牧区,人均“财富占有量”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生活质量的高低,牧民们的“惜杀”观念长远而又深刻,多以牲畜数量来衡量富裕程度,许多拥有上千头只牲畜的“富裕牧户”为求数量而牺牲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生活质量仍维持在最低水平,与非富裕户的生活无大差异。

交换行为,为什么西藏牲畜的出栏率和商品率水平极低,部分牧民的温饱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脱贫后的返贫率较高,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因受生态环境限制,西藏草原的载畜能力十分有限,牧草生长期也仅有6个月左右,冷季草场严重不足,加上传统的以游牧为主的经营方式,草地生产力明显低于全国水平,每公顷草地的畜产品产量比内蒙、新疆低2~3倍。由于改良草地与人工草地等草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面积很少,网围栏也还未普及,抗御风雪和冰雹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据我国畜牧专家的分析,西藏自治区天然草场的每亩年产草量不足50公斤,平均计算,每30亩草地才能满足一只羊的饲草需求^①。1993年自治区的牲畜总存栏数为2319.89头只,其中大牲畜存栏为587.59头皮,羊的存栏总数为1712.61只,其存栏总数相当于4656.16万个羊单位^①。因此,要近14亿亩的草场才有可能承载现有的牲畜量,而现有的可利用草场面积为8.25亿亩,照此看来,自治区现有草原的超载率高达41%左右,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草原的过载现象毫无过之。

草场相对不足,草原严重超载的直接后果就是草地的退化,甚至沙化。西藏自治区已有近1/3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约占一半左右。还有约1/10左右的草地已明显沙化。西藏主要牧区——那曲,其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原两大类草地的平均产草量从60年代的2760公斤/公顷与1175公斤/公顷,分别减少到90年代的1107公斤/公顷与511公斤/公顷,减少了50%~60%;相应地,营养成分差或者有毒的杂草增长20%~30%。与民改前相比,西藏牲畜单体生产能力明显减少,牛酮体减少近50%,酥油产量减少近10斤,绵羊产毛减少近0.5斤^②。

人口增加、牲畜规模扩大后,人类活动更加频繁,活动区域更加广阔,而且还引发了诸如野生动物的活动空间退缩,动物的质量和数量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野生动物是青藏高原草原生态链中重要一环,一些野生动物对维护草原生态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大型鸟兽处在食物的顶级阶段,对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的消失很容易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调。据有关资料表明,草原鼠通过打洞引洞,破坏牧草的根系和草原的土壤结构,使草原的生产能力一般下降30%~40%,严重的下降60%,70只草原鼠一年能毁掉一亩优质草地,一只狐狸一年最少能维护100亩以上草场的安全。每头棕熊一年能挖食3000只左右的鼠,最少能保护40亩草原。又如岩羊是雪豹的重要食物源,有了雪豹就能控制豺狼的发展,减少野兽对家畜的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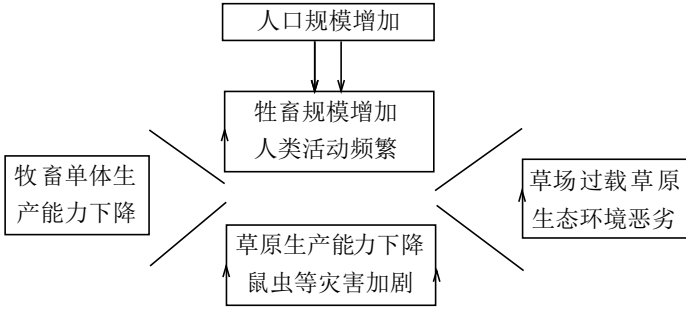
人类活动引发的不仅仅是草地退化,同时还加剧了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鼠虫灾害在近几年中越来越严重。人们不得不依靠毒饵进行控制,由此又引发了新一轮草场恶化。有关研究表明,目前全区鼠害面积约在5000万亩左右,每亩平均有草原鼠50只以上,每250只草原鼠年消耗草量相当于一只羊的年食草量,那么这25亿只草原鼠的年消耗草量就相当于1000万只羊的年食草量。过去日喀则、那曲地区有些地方为保护牧场,撒放大量毒饵以消灭危害草原的害鼠,毒死害鼠的同时也杀死了大量的以鼠为生的猛禽猛兽,没几年鼠害便卷土重来,蔓延甚快,危害更大。主要原因是猛禽猛兽的繁殖能力低,周期长,而繁殖能力强的草原鼠从低密度中迅速繁衍起来时,猛禽猛兽的增长还在萌芽中,结果导致了鼠害的泛滥,草原的进一步退化,草畜矛盾的进一步扩大。草畜矛盾扩大导致的最可视现象就是牲畜单体质量的下降和抗病抗灾能力的减退,体弱多病而又数量众多的牲畜必将对劳动力的

① 一个大牲畜相当于5个羊单位。

② 该组数据来源于作者1992年在西藏藏北牧区的实地调查。

数量有较高要求,这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人口的增长,形成了新一轮恶性循环,见右图。

由此可见,西藏自治区现有草场资源已不能承载现有牲畜,草畜矛盾十分尖锐,而导致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口,特别是牧业人口的过快增加。自治区副主席杨



松同志曾指出:“现在西藏不是草畜矛盾问题,而是人、草、畜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一论断道明了西藏草原畜牧业发展所面临问题的主要根源。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应该下定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地降低牧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坚决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与此同时,坚决淘汰老畜、病畜,千方百计提高牲畜的出栏率和商品率,如不这样,我们将会严酷的自然面前无所适从。1997年的雪灾,致使西藏的主要牧区,那曲和阿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阿里地区的牲畜死亡率在60%左右,那曲地区的牲畜死亡率在40%左右。据有关人士介绍:1997年的雪灾已使阿里近一半的牧民成为绝畜户,那曲地区近1/3的牧户成为绝畜户,即便有政府大力的救助,我们也敢在此断言,这些绝畜户中的大多数将会成为赤贫户,西藏的扶贫攻坚工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①。

三、几点体会和建议

1. 应进一步认识西藏人口的有序发展关系到当地的社会、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当前的有利形势,将农牧区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宣传为主,自愿为主,服务为主”转向全面的贯彻和实施阶段。

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影响了本地区经济健康、迅速的发展,同时又对西藏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是导致相当部分农户贫困的直接原因,我们应该看到这一问题对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所生产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显著的。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下,正在全力以赴的抓经济建设,最近两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左右,而人口过快增长的态势又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形势十分喜人。但应看到,21世纪的到来,西藏的扶贫攻坚工作即将结束,这会不会意味着西藏农牧区新一轮无序生育的开始,因为西藏农牧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在近几年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扶贫攻坚,特别是各对口支援方对农牧区计划生育工作的真抓实干,这些人员将在近一两年撤出,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和服务出现真空难以避免。鉴于如此,我们建议:

从现在起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各级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向内地学习,将此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将计划生育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政绩的重要指标。像抓粮食生产那样,进行目标管理。只有这样,今后西藏农牧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才会有人真抓实干,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2. 加大医疗援藏的力度,使医疗下乡、医疗援助、医疗扶贫制度化、经常化。

因交通不便、财力不足,特别是医疗卫生人员的极度匮乏而导致的服务不足是过去西藏的计划生育工作不能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原因。我们呼吁:在今后的援藏工作中,应加大

^① 资料来源于1998年4月在北京与中央党校西藏班部分学员的座谈笔录。

医疗援藏的力度,通过派援藏医生和送医疗器械充实西藏县一级医院的医务力量,改善基础性医疗设施,努力使县一级医院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医务人员严重匮乏的局面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善。山东省对西藏白朗县的援助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来虽然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对口支援方加大了医疗援藏的力度,有的地区还“不失时机”地向西藏派出深受当地群众欢迎的医疗队,并深入到基层农牧区为藏族群众排忧解难。但应看到,这样的医疗援藏并未经常化更没有制度化。这种援助的时机大都发生在西藏几年一遇的各种“大庆”时节。我们希望对西藏部分偏远和贫困地区的援助能经常化。能否考虑一年向这些地区派一次医疗队,同时向当地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农牧民赠送一些药品。一年一次的医疗下乡再加上本地的卫生力量就基本上能满足当地农户在计划生育方面的服务需求,也会对提高当地医疗卫生队伍的素质,改进和提高服务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能否借鉴内地“西藏中学”的经验^①,在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卫生学校(院)设立专门的西藏班,招收农牧民子弟或是对农牧区基层的卫生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最基本和最适用的医疗技术,在老师的指导下,用更多的时间让他们进行实践^②。如果采取这样“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再加上本地区的努力,西藏医疗卫生状况十分落后的状况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改善,这将十分有利于巩固扶贫攻坚在计划生育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将会对西藏人口、经济的和谐发展以及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产生积极的影响。

3. 排除外来干扰,根据西藏的实际和本地区人民的愿望,制定并实施人口发展战略。

自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政府及其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对于西藏的人口发展政策一直采取了非常宽松和灵活的政策,而对占人口85%以上的西藏农牧民的人口发展基本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控制措施。即便是在我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和绝大多数人口中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控制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后,西藏农牧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只停留在宣传上,只是在西藏城镇的干部职工中间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控制生育的政策,其中又对生活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和职工的生育采取了与内地一视同仁的严格控制政策。所有这些均反映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考虑了西藏的特殊实际,特别是充分考虑了当地藏族人民的愿望。这本应该是中国政府尊重西藏人权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得到了许多真正关心西藏的发展、真正关心西藏人权的全世界有识之士的认同和赞誉。令人遗憾的是,即便这样,还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无端攻击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人口发展政策,说什么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强迫藏人绝育、堕胎甚至是溺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这样的无中生有和恶毒攻击在近10年有加剧的趋势,1989年2月26日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89年美国出版的《西藏评论》(Tibet Review)、《西藏今日》(Tibet Today)、《文化延续》(Cultural Survival)、《喜马拉雅研究》(Himalayan Research)以及登载于1988年出版的《亚洲观察》(Asia Watch)上的“西藏人权”(Human rights in Tibet)一文均配合国外分裂势力大肆攻击和诬蔑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人口发展

① 我们认为:通过在内地设立“西藏中学”帮助西藏提高教育水平是所有援藏工作成效最显著的方法之一。一个现象就能说明问题,近几年来,在西藏的城乡,谁家的孩子要是考上了内地的西藏中学,那将成为这家最值得庆典的事情,其庆典的隆重度与西藏庆典最主要的节日——藏历新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②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西藏的部分乡村也有少数受过专门培训的基层卫生员,但据他们反映,他们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除了知道了许多的大道理外,基本没有机会进行实践,回乡后一是因为缺少药具,二是没有治愈的把握,这样的培训效果并不显著。

政策。这样的不实之词还经常能在国际互网络中觅见,在此就不一一列举。随着国际互联网应用在近几年的大幅度普及和提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更大,我们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首先应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针锋相对且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让世人真正了解西藏的实情,了解西藏的发展变化。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就西藏问题对外进行的宣传无论是方式方法或是在力度上均不能很好的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就西藏问题很难听到我们国家的正义声音,充斥有西方媒体上的大多是歪曲的报道和别有用心言论,就连以上提到的美国的报刊书籍就我国政府对西藏人口发展政策的诽谤,我们也没有进行针对性的反驳,站出来进行反驳的却是两位诚实的美国学者马尔文·高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和辛西亚·贝尔(Cynthia M. Beall)。

随着西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西藏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西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不断减少的同时,人口的机械变化也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增加,有越来越多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人员进入西藏经商、兴办企业或是承包工程。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藏民到内地或沿海地区学习、进修、经商或是工作。近几年来,国外的分裂势力又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说什么“中国政府在大规模、有组织的向西藏移民,西藏的藏族已成为少数民族”。西藏人口的机械变化在加剧是客观事实,我们不应该回避。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每一位中国公民都有自由旅行、迁移、出外谋生的权力,藏族可以到内地学习、工作和生活。那么,我国其他民族的人又为什么不能前往西藏自治区生活和工作呢?如果这种权力不能在我国各民族中间平等体现,那才叫没有人权。在我们今后的对外宣传工作中,应理直气壮地正视这一问题。

我们还应看到,汉族等其他民族进入西藏是西藏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正在逐步打破西藏传统而又封闭的自然经济。商品的大流通,人员的大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此外,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十分关注西藏的建设事业,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区加强了对西藏的投入和援助,“43”项工程及“62”项工程的先后上马、“一江两河”的开发、“对口援藏”工作的深入,揭开了西藏社会主义建设新的篇章。如果仅仅依靠西藏的力量,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工程和开发项目是不可能的,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方,地方大得很,单靠200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向前列”。

参考文献:

- [1] 西藏统计局. 1994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 [2] 西藏统计局. 1992年藏族人口讨论会论文集.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 [3] 肖怀远. 西藏产业论.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王树新]